

出书 出人 出经验

季 啸 风

大学出版社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气象。现在,全国已有二十五所高等学校办起了出版社。

大学出版社在学校中是与图书馆、研究所同样重要的学术性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为学校的教学工作、科学研究、教材建设服务。

高等学校有一支包括多种学科的学术队伍,是作者、编者、读者荟萃的地方,既是教学的基地,又是科学研究的基地,因而有办出版社特有的优势。大学出版社将成为全国出版战线上的一个重要方面军。

大学出版社的建立,为文科教材建设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本文想结合大学文科教材建设的历史和现状,来谈谈我对大学出版社的方针任务方面的意见。

—
首先介绍一下大学文科教材建设的历史发展概况。

旧中国的大学文科教育,从学制、课程到教材,有很多是搬用欧、美、日本等国的,在搬用中,真正能够自觉地把外国的东西同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相结合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新中国建立初期,大学文科教育,百废待兴,一时顾不上、也没有条件来建设自己的教材,有许多课程,就靠翻译、借用苏联的。在一段时间里,尽管我们有了把外国经验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针,但由于缺乏经验,也出现过不少机械搬用的偏向。

一九五六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鼓舞下,教育部曾经组织过一部分文科教材和教学大纲的编选工作,但不久就因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而中断了。

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和“教育革命”的形势下,许多学校纷纷组织师生合作编书,搞“大兵团作战”,想“苦战几昼夜”就能“放出卫星来”,革命的热情和干劲确实感人,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态度,特别是错误地否定了教师的主导作用,有些地方把“破除迷信”推到了破除科学的极端,虽然编出了一批教材,但真正合格的却极少。

一九六一年,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在周扬同志主持下,从调查研究、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入手,组织全国的学术力量,包括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和在科学研究部门工作的,包括老年的和中、青年的,重新制订了教学计划,编制了文科七类专业主要课程的教材编、选、翻译计划,并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的教材编选工作。由于在工作中正确贯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比较充分地调动了老、中、青学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正确地坚持了主编负责制和专家审稿制,在短短四年多时间中,先后出版了一百四十多册教科书和参考教材;通过编书,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中青年学术力量;积累了比较系统的教材建设经验。这一段,至今被誉为文科教材建设的“黄金时代”。

“文革”十年中，文科教材建设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文科教材建设逐步有所恢复，开始跨进新的阶段。一九七八年，教育部重新肯定了一九六一年中央书记处批准的文科教材建设方针，在较前更广的范围和更大的规模上，重新编制了教材编选计划，组织全国高等学校的力量，着手新的编选和修订工作。截至一九八三年，先后列入编选计划的六百二十四种教材（其中，新编的五百二十一种，修订的一百〇三种），已经出版了一半以上。这批教材，尽管质量参差不齐，但对于解决因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严重“书荒”问题，稳定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还是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期间，出现了几校、十几校以至二十几校联合编书的新形式。它的优点是集中于各校学术优势，发挥集体的力量，但也有一些教材，由于未能有效地坚持过去长期行之有效的主编负责制，因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教材的质量。总的看来，这一段工作的成绩还是显著的。原有的一批教材，经过修订，内容有所更新，质量有所提高；新编的一批教材，填补了一些多年的缺口。尤其可喜的是，一批中年学者，挑起了主编的重任。这就为今后的教材建设打下新的基础。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办公室重新恢复。一九八三年下半年，经过必要的准备，先后在十三所高等学校新建或扩建起以出版文科教材为主要任务的出版社。这批出版社建成之后，文科教材出书难、出书慢的问题将会大大缓和，一俟正待批准建立的六所大学出版社全部获准建成，文科教材的出版问题将基本上有了保证。这是建国后最好的形势。

二

教材建设是教育事业中的一项基本建设。回顾三十多年来的文科教材建设工作，我们深感，在教育方针问题解决之后，教学质量的问题最后总是落在教师和教材问题上。譬如治国，“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学校的主体是学生，学生的知识食粮就是教材。没有教材，谈什么办学？没有合格的教材，谈什么提高教学质量？又如用兵，“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办学也是一样，教学未动，教材先行。六十年代初，中央书记处曾专就教材问题作出过必须“课前到手”的指示。一九七七年，小平同志在谈到教育质量问题时指出：“关键是教材”。一九八二年，耀邦同志在谈到出版问题时，进一步指出：“课本的出版工作，任何时候都要放在第一位。”如果要总结教育经验的话，这就是一条基本的经验。

三十多年的实践反复教育我们，文科教材建设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从我国实际出发，根据教学需要，通过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借鉴外国学术成果，特别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使“中外古今，熔于一炉”，用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不断充实、更新教材内容，为学生提供营养价值较高的“食粮”。

所谓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决不是摘引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词句，把现成的结论作为套语，空发议论，乱贴标签。在教材中，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不仅表现在理论教材的论断和历史教材的述评上，而且表现在知识的正确选择和介绍上。论断必须有充实可靠的材料作依据；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述评必须尊重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历史事件的成败得失，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应当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寓评于述。

所谓整理遗产，就是要批判地继承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方法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目的是使“古为今用”。东汉王充说得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温故知新，可以为师”。毛泽东同志说得更好：“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钻进古籍之中，昏昏昧昧，不解世事，还谈什么“三个面向”？同样的，耳聋眼瞎，“忘记祖宗”，也有愧于大学生的光荣称号。

所谓借鉴外国，就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凡属有价值的对我们有用的，都要敢于“拿来”，为我所用，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洋为中用”；凡是不科学的有害的东西，必须旗帜鲜明，敢于批判、抵制，并在批判和抵制中来提高我们的鉴别能力和免疫能力。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必将落后，而落后就不免挨打；香臭不分，活剥生吞，必受其害。

所谓总结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就是要自觉地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加强调查研究，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要从中探索出规律，作出理论概括，用这些研究成果来丰富和发展各门科学理论；对于不正确的东西，要从中吸取教训，以为前车之鉴。这是教材内容不断更新的主要源泉。

教材建设同学术建设有密切的联系。教材的水平正反映着整个学术界的水平，通过教材编选和讨论又有助于活跃学术空气，推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因而也为提高教材质量打下基础。

编写教材同撰写学术论著，有相同的要求，又有不同的要求。教材和学术论著，都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都要能给人以知识的武装和智能的启迪，这是相同的。作为个人的学术论著，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会得到承认，至于学术见解，他可以写“一家之言”，本“百家争鸣”的精神，开展学术讨论。教科书则不同，它应当向学生提供比较成熟的经验总结和比较肯定的研究成果，保证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这倒不是说学术问题的是非，在教材中必须定于一尊；相反，不同学术观点的作者，可以分别编出学术观点不同的教材，在一本教材中，除了向学生介绍稳定的知识和最新的学术成果外，还应该向学生介绍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正在探索的学术问题，目的是启发他们独立思考，提高他们的鉴别能力，引导他们注意治学方法的锻炼，培养他们树立优良的学风。可见，编写教材比撰写学术论著有更高的要求、更大的难度，因而从事教材建设的劳动也就应当受到更多的尊重。在这方面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行规定，硬把教材建设同科学研究人为地分割开来，不承认编写教材的劳动是教学劳动，不承认教材是科学研究成果，已经给教学工作带来本来可以避免的消极后果。凡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我以为应当大胆地、坚决地加以改革，否则，教材建设就没出路。

三

一九六一年，中央书记处就曾提出，教材建设，首先要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接着，就要不断解决“从有到好”的问题。简言之，要“先有后好”。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实事求是的方针。

一九八三年国庆前夕，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整个教育事业指明了方向，也向大学文科教材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

文科教材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包含着相当繁多的内容。六十年代初，在“书荒”相当严重的情况下提出的“有无”问题，仅仅是文科七大会专业的基本课程所急需的理论教材、历史教材、资料选本和工具书，即通常所说的“论、史、选、具”。以历史专业为例，主要是指史学概论、中外通史、各种历史资料选编和年表、地图等等；断代史、国别史也列了一些，但远远谈不上“成龙配套”。至于象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外关系史，边疆沿革史等，许多都还未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环顾当前的实际情况，二十年前没有的教材，今天多已有了，有的还有几种不同的本子。但是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些新的学科不断出现，新的课程陆续开设，旧的“有无”问题解决了，新的“有无”问题又出现了。

我们不仅要有供全日制本科生用的各种“论、史、选、具”，而且随着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种办学形式的出现，随着研究生数量的不断增长，还需要有供应各种办学形式、各种学别的学生以及研究生所需要的教材。

我们不仅要满足课堂教学的需要，而且要满足学生们日益增长的课外自学的需要。根据“三个面向”的要求，教学改革的趋势不可阻挡，从教师、学生到家长，大家愈来愈不能忍受那种“满堂灌”、“抱着走”、“用教小學生的办法教大学生”之类不正常的现象继续下去了。要加宽学生的知识基础，扩大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能力，锻炼他们的治学方法，迫切要求为广大的学生提供各种课外自学用书。在这方面，我们的思想远远落后于形势，预见性不够，听取各方面的呼声不够，行动迟缓，应当急起直追。

我们还不仅要有供学生用的教材，而且要尽量满足教师的需要。以各种资料选本为例，现在供学生用的选本，一般都是根据学生在校期间所能接受的程度，经过选择编出来的，分量不能过大。但是，教学科研人员的需要就广泛得多，篇幅就不必作过多的限制，内容也可以精华和糟粕杂陈，因为精华与糟粕本来就是要靠他们自己去区分的。因此，就需要有适合各种对象用的选本。这方面的工作，许多正处在分散的无计划的状态，需要统一加以规划，既要能尽量满足各种不同的需要，又要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编印。

一九八一年九月，中央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作出了关于整理古籍的指示，提出要“从小学开始，就让学生读点古文”，“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这是一件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古文今译的任务，在文科教材领域势必作出切实的安排。

特别要提出的是，我们不仅要满足本国学生的需要，而且随着来华生数量的不断增长，随着大批海外华侨子弟对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愿望的不断增长，随着外国高等学校学习中国文化历史知识的要求的不断增长，我们还要有计划、有系统、有步骤地提供他们需要的各种教材，这是应负的爱国主义的责任，也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可见，填补缺门，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是长期的任务。

解决“有无”问题，只是教材建设的最低要求。在解决了“有无”问题的地方，紧接着就面临如何“从有到好”的问题。学无止境，教材的质量要求同样没有止境。因此，提高教材质量，同样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衡量一本教材的质量，第一，要看它的观点是否正确先进；第二，要看它的材料是否充实可靠；第三，要看它的叙述是否简明生动。有这三条，才能保证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和启发性。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现有的文科教材，还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第一，为了保证教材的思想性，不仅政治课教材要完整准确地解释马克思主义，授给学生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一般的业务课教材，也应提倡“文以载道”，“寓道于文”。专业教材的思想性，不在乎对某些历史事件硬作政治结论，或对历史人物硬作政治鉴定，而应寓历史事件的成败得失，历史人物的邪正、功过、是非的评论，于客观历史事实的叙述之中。

第二，为了保证教材的科学性，不仅要毫不迟疑地清理过去教材中遗留下来的“左”的痕迹，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还要清醒地防止和有力地抵制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总之，要完整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武装学生。

第三，为了保证教材的先进性，需要不断更新教材内容，把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反映到教材中去，以防知识老化。

第四,为了保证教材的实用性,不仅要把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起来,而且要求程度深浅适度,分量轻重适度。目前,教材的篇幅有不断增大的趋势,务必下决心删繁就简。

第五,为了保证教材的启发性,教材除了要担负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任务,还应该给学生以治学方法的启示。人们在强调治学方法时,提出“授人以鱼,不如教人以渔”,“给他一袋干粮,不如给他一支猎枪”,这无疑是正确的。作为教材,应当既能“授人以鱼”,又能“教人以渔”;既要给人“干粮”,又要给人“猎枪”。

四

文科教材建设,向大学出版社(主要是那些承担文科教材出版任务的)提出什么要求呢?概括说来,就是“出书、出人、出经验”。

首先讲出书。

一般地说,所有出版社的任务,都是出书。

特殊地说,大学出版社的任务,就是出教材,包括教科书、参考书、课外读物、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学术著作和教学、科研所需要的各种资料。

更加特殊地说,担负文科教材出版任务的出版社,应当主要是出版文科教材。

明确这一点,就可以摆正大学出版社在学校中的地位,处理好大学出版社同其他出版社的分工协作关系。

有同志提出,大学出版社“要做聚宝盆,不做摇钱树”,这是说得很对的。所谓“要做聚宝盆”,就是要“多出书,快出书,出好书”。大学是学者荟萃之所,有它潜在的优势。现在的问题是:写作力量大于编辑力量,编辑力量大于印刷力量,很多学者的著作,因为是“短版活”,所以“出书难”。大学出版社,应当把一切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选来出版,使自己成为一个学术“聚宝盆”。所谓“不做摇钱树”,就是不要以盈利为目的。不论“长版”、“短版”,只要有学术价值,都应本“以丰补歉”、“以战养战”的方针,组织出版。

要能“出好书”,选题是关键,调查研究又是抓准选题的关键。编辑部应当成为学术界的集体伯乐。“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在大学出版社编辑部的视野之内,应当不放过任何一本有水平的教材和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编辑部又是出版事业的集体组织者,在选题时,“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讲真理”,就是要严格根据学术水平组织书稿;“不讲面子”就是不要使不够出版水平的论著滥竽其间。

历史上许多优秀的学术著作,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深山大泽,藏龙卧虎”,一旦发现,就应该选进。但是,为了加强出版工作的计划性,必要的出书规划,还是要认真做好。要根据专业分工定选题的范围,根据教学需要定出版的缓急,还要根据读者的反映作调整。

其次讲出人。

通过编书培养人材,通过选题和组织编书发现人才,是出版社的重要任务。一般说来,经验在老年,工作靠中年,希望在青年。在出版工作中,要提倡尊敬老年,依靠中年,扶植青年。不论是老年的还是中青年的,也不论是知名的还是不知名的,只要是学有专长、学有成就的,都要组织起来,成为教材建设的骨干队伍。“荐贤”是编辑人员的天职,在这方面,应当提倡“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里的所谓“亲”,是指学术观点一致;这里的所谓“仇”,是指学术观点不同。只要是名副其实的学者,都应一视同仁。当前的突出问题是要下大力去发现学术界的后起之秀,一旦看准,就应大胆委以重任,切不要论资排辈,乐坛拜将。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才辈出提供了可能性,

(下转第50页)

他们在本书的《总论》中专门论述了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方法，我以为不但论述本身很有见地，而且在全书中是贯彻得比较好的。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这不仅需要满腔的热忱，还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必备的知识。

任何社会变动必然在人们思想上引起不同的反映，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也是这样。广大的人民群众从改革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锦绣前程，因而由衷地拥护党的决策。但是也确有一些同志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还有某些误解或曲解。其中一个带有相当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弄不清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与进行改革的一致性，弄不清坚持毛泽东思想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一致性。《大纲》以相当大的篇幅

着力论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恢复、运用和发展，这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是极有帮助的。

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以采取何种体系为宜，目前还是正在探讨的问题。《大纲》的论述体系是否适当，据我所知，作者也还在广泛地听取意见，准备作必要的补充、修订或调整。然而目前的体系至少有一个明显的长处，就是比较全面系统，也便于作教材使用。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优点。希望作者在将来修改时保持和发扬这个优点。

我的理论水平很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尤其没有专门研究。上面的话只是一个读者的零星的读后感。纰缪之处，希望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上接第48页）

但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要靠出版战线上的同志，做好人才的发现、选拔工作，这是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第三讲出经验。

大学出版社大多数都还“年轻”，要虚心向所有老出版家学习。现在，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历史较长的出版社，面临改革的任务；刚刚建立不久或正在创建的出版社，切不要按老章程办事，建起来再改，而应本着改革的精神去创建。什么样的管理体制好呢？照我看，大学出版社只能有一个中心，就是为教学科研服务，出版教材；只要一个头头，就是社长负责制；只需有“一个婆婆”，就是在校长领导之下。这里是事业单位，但要实行企业管理。工资可以浮动，人员要能流动。职责分明，赏罚分明，不吃大锅饭，不捧铁饭碗，不搞终生制。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应当知难而进。现成的经验没有，要靠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大学的编辑、出版队伍，同教学科研队伍一样，也是一支学术队伍，是以组织工作、管理工作为职责的队伍，是担负着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两位一体生产任务的一支队伍，一个百花齐放的花坛，要靠我们的双手去筑成，任重而道远，我们应当努力。